



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

组稿 苏铭强
编辑 曾维龙

为揭露官商垄断媒体之恶果，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邀请老中青三代评论人，撰写系列文章，讨论媒体被政治力量与媒体财团双重垄断的危机，同时也探讨公民社会如何在这个困境中寻求出路，以壮大自主力量，捍卫新闻与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多元竞争发展。

本期目录提要：

2 黄丝带义不帝秦 撰文/黄进发

五年后的今天，媒体秦皇图穷匕见，终于“不计毁誉”正式入主当初处心积虑协助收购的两家报章，掌控85%的中文读者。秦皇想不到的是，五年的时间不但没有让原来的鲁仲连消失，反而让更多年轻的鲁仲连从不同的角落涌现。

5 忧虑可理解，论断并不早 撰文/杨善勇

6 张晓卿媒体帝国不具典范意义 撰文/傅向红

张晓卿大概也不知道，良好的中文媒体典范，如中国时报、联合报等，莫不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学习。诉诸民族主义和中华大一统口号来为垄断背书，其实只会抹煞中文世界和华社内部的差异，其恶果与垄断恶果一致：即一言堂。

8 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撰文/赖昭光

社会要求媒体具有监督社会环境和提供公共舆论场所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张晓卿要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来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社会还没听到有什么高分贝的声音，来自华社民间、读者、大专生反对媒体垄断的声音分贝已经被扭到最模糊的低点了。

10 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 撰文/庄迪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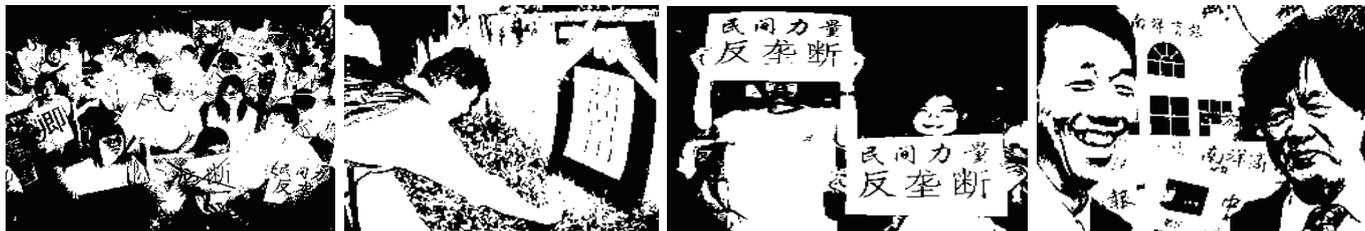
张晓卿今天同时控制两大中文报业集团旗下大约30份报章和杂志，早就具备“媒体垄断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了。

13 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撰文/苏铭强 mksow

“贴，绑，比，搞”，大卿帝国现在仅有的四式。这四式对普罗大众，没什武功的朋友来说，或许还有点扰惑的作用。但是，招式用久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四下，终会有被大家看破的一天。

15 星洲只靠一面之词 撰文/杨柏杨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The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呈献





目录

编辑弁言

2001年间，北京三联书店为陈寅恪先生再版全集时，以其名言作为封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么一句话于1929年铭刻于清华大学内王国维纪念碑上，至今依然为人所津道。

吾辈每思及此，无不处以高山仰止之情，而向往之。WAMI 以维护马来西亚媒体独立自由为宗旨，在努力推动马来西亚民主事业的同时，也倡导理性思辨，以开拓舆论空间为己任。WAMI 电子期刊的目的，正是以此为前提而行于世。

本期既为第一期，也是“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的第一击。由苏铭强组稿，从2006年11月6日开始至12日为止，以七篇文章为一单元系列，每日同步于《当今大马》(<http://www.malaysiakini.com/cn/>)、《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com/>)、《黄丝带》(<http://www.wami528.com/>)等马来西亚中文网络媒体，以及《东方日报》刊登。本期将之集结，以电子期刊的形式，系统地向读者推介。文章撰稿人以 WAMI 成员为主，首先第一篇文章便是我们的主席黄进发。

除“黄丝带运动系列文章”之外，尚有一栏“文献资料”，主要是WAMI过去所发表过的文告和纪事资料。《黄丝带》网站开篇辞便是引自《黄丝带》网站。此文详细述说了WAMI的缘起，以及“黄丝带运动”之肇端，此处不再赘言。最后，欢迎各界提出批评和指正。我们也欢迎不常上网的读者们，打印和传阅，以让更多社会人士得以分享。

系列文章

- 2 黄丝带义不帝秦 撰文/黄进发
- 5 忧虑可理解，论断并不早 撰文/杨善勇
- 6 张晓卿媒体帝国不具典范意义 撰文/傅向红
- 8 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撰文/赖昭光
- 10 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 撰文/庄迪澎
- 13 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撰文/苏铭强 mksow
- 15 星洲只靠一面之词 撰文/杨柏杨

文献资料

- 16 《黄丝带》网站开篇辞
—— 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The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网址: <http://www.wami528.com/>

电邮: wami528@walla.com

欢迎列印传阅。如欲引用或转载，请说明来源出处。

系列一：黄丝带义不帝秦

撰文／黄进发 2006-11-06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政治学者

公元前257年，秦国发兵围攻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刚出兵，秦王就派人警告说：我不日就要拿下赵国，谁敢多管闲事，我灭赵之后就先对付他。魏王吓坏了，就下令魏军半途休息观望形势，同时派使者新垣衍劝赵王一起共尊秦王为帝，让秦国退兵。

齐国高士鲁仲连当时住在邯郸，听说此事，跑去警告新垣衍：“秦是虎狼之国，不讲仁义只重军功。他若称帝，我宁可投身东海而死！如果魏王看不到秦王称帝的害处，那我将劝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新垣衍不信，鲁仲连就举商朝末代暴君纣王如何残害三个大臣的故事说明。第一个大臣九侯自以为女儿美丽，把她献给纣王，纣王觉得她丑，就把她爸爸煮成肉酱；第二个大臣鄂侯为九侯仗义执言，结果也被杀了做肉干；第三个大臣文王长叹一声，结果被囚禁了一百天，几乎也被处死。

“今天秦、魏都是大国，各自称王；为什么只因为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要尊

他为帝，让自己处于肉干、肉酱的地位呢？秦王一旦称帝，就要行天子之礼，号令天下，到时将把在各国朝廷根据本身喜好安排人事，并把秦国美女送进魏王的后宫，魏王到时还会安全吗？将军到时还会得宠吗？”

鲁仲连这一番话警醒梦中人，新垣衍拜别离赵，不再谈尊秦为帝的事。秦军听说此事，连夜退兵五十里。不久，魏国一位王子夺了援军的控制权，赶来解了赵国的围。

鲁仲连是不世出的人物。在他之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说服东方六国抗秦。鲁仲连之前，还有一对可爱的同学苏秦和张仪，同拜策略家鬼谷子为师，后来一个主张南北合纵抗秦，官拜赵魏韩燕齐楚六国丞相（“六国大封相”原典），另一个主张东西连横亲秦，掌秦国相印，表面上是各为其主，实际上是联手把各国王侯玩弄于鼓掌之间，把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鲁仲连义不帝秦36年后，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再12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三户亡秦。然而，大一统思想已经深植在中华



文化当中。纷乱中充满生命力、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读书人再不见鲁仲连、苏秦、张仪这般清醒的人物。除了少数隐士，大多数读书人都成了忠君爱国分子，甘为一家一姓卖命，只敢期望甚至幻想当朝皇帝天纵圣明，不会随便把大臣百姓做成肉酱肉干，却不敢问：怎样才能确保只有天纵圣明的家伙才能当皇帝？或者怎样建立一个会自动淘汰昏君暴君的机制？追根究底，為什麼非要有皇帝不可？

为什么鲁仲连之后的读书人都敢冒成为肉干、肉酱的风险，去为皇帝打天下、治天下？一个解释是，他们天真无邪，像张艺谋《英雄》里那位心存“天下”的剑客，相信竞争是坏事，必然会互相残杀，生灵涂炭，反而统一了就天下太平。他们不明白，统一的天下，像装了所有鸡蛋的篮子，竞争只会更激烈，必然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另一个解释是，这些读书人其实并不幻想什么为万世开太平，而是清楚知道丛林法则。他们认定某个强者是皇帝后，就会自动表现得像猎狗，会为了讨好皇帝去咬他的敌人，咬皇帝敌人养的另一批读书人。有一些像李斯，也伺机咬和自己共事一主而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读书人。另一些像司马懿父子，为皇帝

打天下时，心里也可能悄悄想着皇位。当然，也有一些读书人比较可爱，不喜欢咬人争宠，但是，他们也同样不敢质疑皇帝存在的合理性，而会找出种种理由提醒自己皇上如何伟大。

伴君如伴虎。这些读书人有些得到善终，有些还能入凌霄阁、忠烈祠。更多人却是鸟尽弓藏，甚至是“狡兔死，走狗烹”，像刘邦和朱元璋的开国功臣；或者像李斯一样，采着别人的尸首爬上去，最后轮到别人也踩着自己的尸首爬上去。为什么读书人那么迷恋权力？大陆一位作者李国文说这是一种“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读书识字，便要出人头地的基因在作祟”。

鲁仲连义不帝秦两千两百五十八年后，南洋有报业被不肖政党强娶。不管当事人怎么否认，明眼人都看得出政党后面有亚洲梅铎的暗助。长久以来，华社对国家的抗争都是依赖华文报动员；而今要对抗的对象竟是被劫持和共谋的华文报，仗要怎么打？

有人主张避重就轻，只反对政党控制，不反对媒体垄断；有人尴尬失语；有人继续风花雪月，只恋花踪处处，不见血迹斑斑；有人爽爽起义后急急反悔；有人声凄厉诉苦暗夜被人胁迫，却未见人影；有人封锁新闻，坚

持秦王无意称帝，乃是小人恶意造谣；而秦王则隔海大谈经略天下的雄心，呼唤中华情意结。

所幸民间社会正气，浩浩荡荡，既反政党控制，也反媒体垄断，黄丝带到处飘扬，昭示义不帝秦的决心。甚至连涉案政党也一分为二，几乎让霸占报业的阴谋功败垂成。怀有



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帝

道德勇气的华商更剑及履及，直接集资向政党献购，暴露不肖政客的嘴脸。

九十多只健笔，更毅然告别四家不幸沦落在政商不神圣同盟手里的中文报。李敖曾言：“英雄宁可无地用武；也不降格用武！”

罢写四报的评论人却未曾因此停笔，反而接二连三开创新的言论空间或支援愿意追求新闻自由的媒体机构，从《光华日报》、《当今大马》、《时代报》、《天网》、《自由媒体》、《民间评论》、《劲报评论》、《东方日报》、《航》、《独立新闻在线》、《视角》到燧人氏、大众科技等出版社，未曾松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更与“独立新闻中心”（CIJ）等公民社会其他同道努力推动全面的媒体法律改革，并追求广义的自由民主改革。

再五年后的今天，媒体秦皇图穷匕见，终于“不计毁誉”正式入主当初处心积虑协助收购的两家报章，掌控85%的中文读者。秦皇想不到的是，五年的时间不但没有让原来的鲁仲连消失，反而让更多年轻的鲁仲连从不同的角落涌现。

我们不怕冒犯秦皇，我们完全不在意失去李斯大人的青眼，我们很高兴阿房宫的文化累积里没有我们的贡献，因为我们不会是焚书坑儒中坐以待毙的受害者。

像两千年前的鲁仲连，我们是自由的中华魂，我们将永远反抗皇帝，我们誓言埋葬恶法！我们挥舞黄丝带，我们义不帝秦！



系列二：忧虑可理解，论断并不早

撰文／杨善勇 2006-11-07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会员、政论专栏作家

或因感念“中文报要维持今天的局面和迎接未来的挑战，确实不易”；2006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发表《忧虑可理解，论断太过早》，挺身而出为张晓卿入主南洋报业之行大力护驾。

叶宁不惜引用毛语录的话说：“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瞭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恳请读者不要预先判决张晓卿的诚意。从他所拥有的星洲集团的表现出色，读者应该对……有所期许，而不是仓卒的给予负面的评价”。

坦白地说，我不能确定此言是否真的出自毛泽东。无论如何，按照常理，倘若从一个人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同理，从垄断的过去自可瞭解被垄断的现在和未来。

关于此点，2001年6月8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文告《停止供稿决定不变》已经清楚点出以下五点：

一、新闻从业员及报社所有员工、广告商、派报人的利益也将受到单一集团的操控。

二、职工会无法向雇主争取最佳的福利。

三、广告刊户也失去谈判价格的条件。

四、更令人担忧的是：言论空间将相对萎缩，读者的利益也将受到剥削，只能接受到出自同一垄断集团所生产的同质性讯息。

五、其实，不同的报章呈献出百花齐放的

风格，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集团的垄断将使报章丧失风格，剥削读者选择不同风格报章及内容的权力。这也限制了报业的健康成长。

以叶宁个人的阅历说，过去她可以从《南洋商报》转往《光明日报》就职；现在她剩下的选择，只有《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了。顾及这些，我想，非但忧虑可理解，而且论断并不早。

何况，张晓卿曾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9届年会开幕礼发表《中文报业的五大改善空间》，清楚点出办报务必躲开“政治正确”的陷阱”和“不惧“商业正确”的压力。当时他明确地说：

……报业永远要面对和当权派的关系。报业的言论生态背後就是政治的生态。从梁启超到张季鸾，中国报人都有对政治权力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也能争取“不敢说报章说出全部真相，但起码报章不会明知故犯地说谎”。

中文报章也面对商业的巨大压力往往不敢在商业权力面前讲真话。庞大的财团，可以控制很多报章的广告收入，一进一出之间，动辄可以左右舆论，但也使不少真相被隐瞒，谎言被宣扬，使读者失去了“知的权利”……

除此之外，因为四报合一，我邦另外面对中文媒体空间竟被垄断的困境；同样造成不少真相被隐瞒，谎言被宣扬，使读者失去了“知的权利”。马大经济系科班出身的叶宁，为何对此一切完完全全视若无睹呢？

系列三：张晓卿媒体帝国不具典范意义

撰文／傅向红 2006-11-08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媒体系讲师

马华脱售南洋报业股份给张晓卿的新闻在2006年10月17日传出，张氏旗下报纸星洲日报即在第二天，10月18日，于第3版以3分1版的篇幅刊登张氏的垄断大业宣言——“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 建构中文媒体网络”，为老板的垄断行为涂脂抹粉。

张氏在其垄断大业宣言的第二段里头称：“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商报》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们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以行动来印证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

和尊重。”

有能力称霸87%中文报业市场，张晓卿固然称得上商业巨人，但是却不一定够格当媒体典范。张氏为垄断行为辩护说（他在原文使用“有幸参与”这个字眼，五年前星洲说“没有涉及收购”，而今天张氏出来说“有幸参与”，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那是为了“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及“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注意和尊重”。

他大概不知道，中华文化也包含了五四运动及以降的自由主义精神。20世纪的中文报业莫不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都以追求自由民主为办报理念和目标，扮演第四权以监督政府的权力运作。中国时报已故董事余纪忠先生，就是中文报业的优良典范之一。余先生与当时台湾

的执政党国民党走得很近，但并没有因为私人利益而牺牲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新闻的专业自主。他身体力行，发挥“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主动扩大新闻空间。其中一个极佳的例子，就是违抗政府的不合理要求，带领年轻记者冲撞新闻自由的界线，向青年记者展示他的新闻领袖魅力。台湾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杨志弘先生为纪念已故余纪忠先生，在“余纪忠先生引领我进入新闻殿堂”一文曾回忆：

“我个人仍记得，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访问台湾时，在几个有关单位的要求下，希望台湾新闻界能封锁此则新闻，但鉴于索忍尼辛的访台是事实，且是国际间皆通晓的消息，所以中国时报报导了此则新闻。由于中国时报对此则新闻的处理方式，异于其他媒体，因此，新闻同业间展开激烈的争执。余纪忠先生亲自带领



时报团队，以一家报社的力量对抗其余17家新闻媒体。从中，我看到一位媒体领导者的坚持与奋斗到底的精神，对年轻的新闻记者展现了他的新闻领袖魅力。”

从这个例子来看，除了商业竞争外，余纪忠先生还与同业竞争新闻自由的空间，看谁比较能够扩大新闻空间。他向同业和记者展示，如果政府的行政命令不合理，报业领袖应该带头反抗，展示报业自主和争取新闻自由。这种新闻判断与冲撞新闻空间的行为，绝非鲁莽者可为，相反的，它需要高度专业的敏锐度和判断力：既然“索忍尼辛的访台是事实，且是国际间皆通晓的消息”，所以没必要隐瞒台湾大众，所谓欲盖弥彰。就这样，中国时报在这事情上不但抢了头条，还向国民党政府的威权体制展示了报业的自主和自信。

但是我们观察到，张晓卿带领的星洲日报，却是对许多课题噤若寒蝉。面对猪农课题，张晓卿旗下的星洲日报竟然不敢刊登猪农的广告。猪农难道不属于华社的

一分子吗？张晓卿先生收购南洋报业23%的股份，说是要壮大中文媒体“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那么他就应该拿出成绩来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

其实中文报业史上并不乏典范，但张晓卿真的有魄力和能力承担吗？

1999年台湾发生骆志豪泄密案，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超越竞争关系，共同维护同业的利益，集体向立法院争取通过“政府资讯公开法”，并积极推动国民大会将新闻自由明文入宪，使新闻同业们能够在充分的新闻自由下，作无惧的采访。此事件堪称中文报业史上的典范之一，可以说体现了“同业虽竞争，自由相守护”的精神。已故台湾联合报董事王惕吾先生也曾经说，办报精神应该是“资助同业，良性竞争”。

反观张晓卿带领的星洲日报，以打击《东方日报》报贩作为竞争手段；当东方日报的2006年准证被国安部拖延时，张晓卿旗下的报业集团没有任何一家出来捍卫同业的尊严，维护报业的

共同利益：即报业自由与自主。这种种的低劣纪录，说明了张晓卿的媒体帝国只反映了“权力欲望”，没有任何“新闻典范”意义。在张晓卿的带领下，马来西亚中文报业呈现的是“同业相竞争，自由相掠夺”。

张晓卿大概也不知道，良好的中文媒体典范，如中国时报、联合报等，莫不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学习。诉诸民族主义和中华大一统口号来为垄断背书，其实只会抹煞中文世界和华社内部的差异，其恶果与垄断恶果一致：即一言堂。

张晓卿在其10月18日的垄断大业宣言里头还说“通过资源整合和体制梳理，增强中国媒体和西方跨国媒体的抗衡力量”，显示其对自身民族背景缺乏信心和充满不安全感，必须躲藏民族主义背后以抗衡西方来壮大自信。如此没有信心之人，当然需要庞大的媒体网络来为自己的缺乏自信和不够安全感化妆和粉饰，难怪张氏要如此花费心思垄断媒体。

系列四：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撰文／赖昭光 2006-11-9

专栏作家、ICT出版人

一个真正负责的媒体，其定位应当是中性的、客观的，超越集团利益的。首先，它应当以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去客观公正全面的展现可能会影响公众利益的事件的全部真相——“登载确实的消息”（胡适评《大公报》语）。

且不必说几个月前，《星洲日报》如何拒刊登猪农请愿的广告，拒刊登王国丰悬赏取缔贪污校长的广告，如何为校长职工会护驾，眼前一例，仅对比《星洲日报》与4家中文新闻电台《第二电视》、《ntv7》、《八度空间》及《马新社》及两家不受张晓卿控制的中文报《东方日报》及《光华日报》如何报导于113在《星洲日报》总社、新山、檳城及关丹举行的“反对媒体垄断”静坐请愿活动，

即可“凸现”事实并得到结论。

《星洲日报》在选择性只在部分州属以区区437字报导以上事件的手法是如何偏离主题法（没提静坐的诉求是反对垄断媒体），转移焦点法（强调现场有七十多人，其中半数是来自本地媒体，尤以东方日报和网站的职员居多。）片面报导法（没报导现场发言重头人物如黄进发），屏蔽实况法（没有任何新闻图片），掩盖事实法（现场有五辆巡逻警车驻守，两回通过广播促解散聚会），模糊焦点法（指称该活动目的乃关注大马华文媒体发展），报导得极为不心甘情愿，更甬说新闻专业了。

星洲媒体老佛爷刘鉴铨于112发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强调张晓卿“为了贯彻企业和文化理想，不

但不能限制言论，反而必须扩大言论空间，这点道理，显而易见。”但只相隔一天，113发生的事件就把编务总监给考上了，对比这点道理与上述静坐情愿活动的报导，讲一套、做一套的“报人风骨”，更是“显而易见”。这“显而易见”也显露“报人风骨”的晚节不保。

借用文化和思想批评家崔卫平评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媒体应当和“那些被遮蔽，被窒息，被掩盖的东西站在一起”展现完整的事件。因为公众只有真正知道了、了解了事情的全部而非部分真相，他们才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也才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和行动。

选择性只让读者知道“部分”的事实比“完全”的虚假更具有欺骗性。很难想象一个连读者及大专生



的批评及谏言都没有勇气面对的媒体,能够承担起守望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责任,更甬想星洲媒体集团董事长张晓卿如何挟着一句“要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利,唤起东南亚的中华之魂”来为华社“伸张正义”。

《星洲日报》总社当晚动用两架拖格罗里密堵门前来迎迓“一群关心社会,关注大马华文媒体发展的学生”。“礼”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这种待人接物的“武装文化”不是我们的优良的中华文化!

社会要求媒体具有监督社会环境和提供公共舆论场所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张晓卿要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来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社会还没听到有什么高分贝的声音,来自华社民间、读者、大专生反对媒体垄断的声音分贝已经被扭到最模糊的低点了。

连“沟通平台”这种名

目上设计来与读者沟通的“平台”也变成“匿名”谩骂丑化他人的炮台。古代宫殿建城墙、设城门(本地版加上两辆拖格罗里),使这块地方有了明确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皇帝一种封闭的心态,认为此地乃我军的据点(刘鉴铨:“这是我的地方”)。

“沟通平台”当炮台,只准官开骂,不准民点评,炮手还不时挂上马大生,理大生,马六甲人,新山人,企图制造全国大专生及全国市镇老百姓全都成了它马前卒的阵容浩大假像,这种心理状况,不是求个心安,就是狂妄到将全国大专生及全国市镇居民当成自己的马仔!

至于说什么“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大家都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呀,张晓卿这番话如果只是拿来参加花踪文学奖,让诗人评审的“新诗”,得头奖那就恭喜了。但如果

是办报方针的话,可要接受读者公众的检验了!不同声音的激荡,擦出来既然都是睿智的火花,为何如此难以对不同声音持平以待呢?难道还得分辨是什么颜色的火花?既然要“鼓励”不同声音的激荡,怎么没抓紧机会派记者采访静坐众人的声音,反而在报导新闻时“消声”?虚心纳谏才是优良中华文化,声音垄断,不是我们的文化!

中国境内互联网用户在‘雅虎’和‘谷歌’这些搜索网站上搜索不到‘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词,这些关键词被屏蔽掉。我们在《星洲日报》的报纸及网站同样也搜查不到一些星洲媒体列入黑名单的“李万千”、陈学障”、“黄进发”这些字眼。这里是正在迈向2020先进国目标的马来西亚,这种信息垄断!也不是我们的文化。

系列五：垄断的快感建在社会的痛苦上

撰文／庄迪澎 2006-11-10

前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课程主任、现任《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媒体所有权与控制 (ownership and control) 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旨趣, 而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正是所有权集中化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的问题, 即极少数资本家或集团控制多家或多种媒体的现象。在媒体所有权的著述中, 虽然较常见的字眼是“集中化”, 但是在“集中化”和“媒体垄断” (media monopoly) 经常是交替使用的词汇。

学界关注媒体所有权与控制效果之所以持续成为学术与政治关注的焦点议题, 主要乃因为媒体并非一般的商业实体, 在近代社会里, 的确没有一种商业机构能像媒体那样形塑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因此, 当大多数媒体集中在单一或极少数企业家/集团手上, 则这个社会的多元性 (pluralism) 必然大大削弱; 要报章社会意识与政治观念的多元, 媒体所有权的多元是个重要条件。

一名曾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本·巴格迪坎 (Ben H. Bagdikian) 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 描述美国50家大公司对美国传播业集中控制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它们如何控制美国人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就是取名为《媒体垄断》 (The Media Monopoly), 出版后可谓一纸风行, 迄今23年已经出版了

七版。

《媒体垄断》风行23年间, 美国媒体业所有权集中化过程也从没有停止过。本书第二版在1987年面市时, 原有的50家大媒体公司已经缩减至29家; 1990年第三版面市, 上述大媒体公司再减至23家, 到了第四版剩下14家。1997年, 《媒体垄断》出版第五版, 美国只剩下十家大媒体公司,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局面; 第七版在2004年面市时, 美国人的所见所闻, 全赖于五家媒体公司而已。

参阅《媒体垄断》的论述, 张晓卿今天同时控制两大中文报业集团旗下大约30份报章和杂志, 早就具备“媒体垄断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了。

事实上, 过去20年来, 媒体所有权集中化乃至垄断进程不曾停止, 而且我国媒体所有权集中化进程, 不只是单纯的市场“无形手”产生的结果, 更是国家机关那只“有形手”介入干预的结果——除了《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授权国安部长绝对的出版准证审核权外, 2001年马华公会成功收购南洋报业前, 国人不也见识了包括马哈迪、国安部及证券委员会如何为收购行动护航吗?

当《建国日报》、《新明日报》及《马



来亚通报》等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相继停刊，1992年朝日报业有限公司及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先后并购《光明日报》和《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之后，中文报业垄断经营的雏形于焉浮现——尽管就个别报章的销量而言，1990年代仍然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对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和董事经理刘鉴铨而言，一统中文报业之天下，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除了媒体这种宣传机器之外，还有哪一种企业可以全职的、经常性的以一篇接一篇文辞隽永的演讲稿将一个原本藉藉无名的东马伐木商人包装成“情系大中华”和“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文化商人”？除了掌握渗透华人社群、可以帮助两岸问题统战的中文媒体之外，还有哪一种企业可以垫高张晓卿“进京”求见中共高干的筹码？

在2001年以前，《星洲日报》高层和编采部主管最爱以《三国演义》分析中文报业的形势：《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三国鼎立，相互牵制。说起“三国鼎立”，语调虽从容，但心底却充满缺憾，因为“三国鼎立”就是统一天下希望的阙如，谁也不能成为霸主。

刘鉴铨纵横报业40多年，从《中国报》记者攀升到《星洲日报》总编辑，再到今天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不但大半生在《星洲日报》度过，而且40多年报业生涯有一半的日子是身居决策位置。对一个一生都留在

报业、凭藉《星洲日报》才能发现自我的人，任内一偿将“竞争一甲子”的对手收归于自己的影响力之下（虽然自己不是业主）夙愿，这种虚荣感与快感并不难理解。

张晓卿和刘鉴铨固然享受这种独霸天下的快感，不枉此生，但是有远见的媒体阅听人、在野党、华团都不应该分享他们的快感，因为他们的快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痛苦上。

2001年《星洲日报》对声势浩大的“反收购运动”视若无睹；五年后，《星洲日报》仅以一篇437字没有交代请愿主题、语焉不详、刊在读者随时错过的不显眼角落的短文报道11月3日的“反对媒体垄断”请愿活动，张晓卿控制的另外三家报纸则只字不提。此现象不就是论证媒体垄断的弊端的最好注脚吗？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在11月3日发表《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否认张晓卿垄断报业，并且写道：

“两家公司都是大马股市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各项准则，也必须接受当局监管，以向各自的大小股东负责。”这段话读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垄断媒体者惯常哄骗不知情读者的说词。

上市公司虽然得向股东大会负责，但是零零散散的小股东乃乌合之众，要结集起来以超过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去无法左右公司的决策，说易行难。由于每一股都有一票，

持股最多者自然能站在有利位置推展其意图；张晓卿是星洲媒体集团和南洋报业控股的最大股东，他因此掌握了这两家报业集团的决策权，包括定义企业整体目标及企业观点的力行及决定生产资源分配的原则，这就是所谓资源分配(allocative)层次的控制。

易言之，今后张晓卿如何动员两家报业集团结合后的资源去阻止新的业者入场，或者进一步兼并半岛乃至砂拉越和沙巴两州的中文报社，他根本无需事前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媒体所有权多元不仅保障媒体内容的多元，更保障读者—媒体互动关系中读者应有的自主性。诚如张晓卿垄断中文报业后，四大报章旗下员工失去跳槽议价的能力，劳资关系严重失衡那样，读者也失去了向媒体施压，进而迫使媒体改正错误行为的筹码。

报章由不同业主经营，读者可以藉罢买，转而购买其他报章的手段惩戒冥顽不灵的报社，但条件是眼前要有无论质量，乃至购买便利等方面条件都对等的报章可供读者选择。没有这种选择，读者意见的重量大大减轻，因为报社不必担忧读者大量流失去支持其竞争对手。

张晓卿在西马半岛控制四家主要中文日报，市场占有率总和超过85%。其余两份报章《光华日报》檳城色彩浓郁的地方性报章，而《东方日报》则是创刊未及四年的新报纸，幅员及报章讯息量远不及星洲媒体集

团的规模，而且四报排挤（围堵）新业者的垄断行为，也剥夺了读者选择替代报章的机会与权利。

许多欧美国家都制订了限制媒体所有权集中垄断的政策或法规，一方面保护社会多元，另一方面则阻遏占支配地位的媒体公司滥用市场力量打压对手。《东方日报》创刊以来遭遇的发行阻碍，早已揭橥了欧美国家所要防止的这种现象。

中国的法制虽不及欧美健全，但这个张晓卿情牵梦萦的神州大地也正在制订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草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而中国国务院也将成立反垄断委员会。中国反垄断法规定三种垄断行为，即：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本月初在“2006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说，《反垄断法》尽快出台有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因为“引入竞争机制，打破一些行业的市场垄断，可以实现对国家、对社会、对广大企业和职工、对消费者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这个共产国家，尚且认识到“垄断”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弊端。张晓卿，你怎么说？



系列六：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撰文／苏铭强 mksow 2006-11-11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会员、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

吴海瑚的大作《需要他们时，他们在那里？》，让我们来检验一下。看完全文，你会发现，所有的主旋律，还是支持星洲媒体集团的朋友们反驳或攻击批评者的回声四式。或许你会问，这什么四式是什么东东？

第一式：贴。贴什么？标签。没有任何反驳理由，把批评者归类。例如，批评者都是“妒忌破坏”，“别有居心”，“另有动机”，又或者是“背后有其他势力在操弄”。如何得出以上结论？很遗憾，没讲。反正只要你批评我，请从以上罪名找个位子坐。文章中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吴批“民主民权和一言堂都是依他们自己喜好来下定义”。

问题是，“民主民权和一言堂不依他们喜好的来下定义”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没讲。民主民权和一言堂怎样被他们依自己喜好来下定义？也没讲。什么都没讲，怎样证明他人是依喜好来下定义？由此观之，以上所有指责从来都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推论过程，更别说挑战过批评者对垄断的论述。

第二式：绑。绑什么？群体。没有被批评的群体，都被绑架以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例如，“这不是国内新闻从业员的错……”。问题是，我们几时有说过“这是新闻从业员的错”？我们反垄断运动什么时候有批评过

新闻从业员？没有。事实上，对刘鉴铨、许春，萧依钊或星洲媒体集团的任何人都好，我们从来只有爱的呼唤，没有恨的怨怼，我们甚至欢迎刘鉴铨来领导我们反对张晓卿。所以，吴海瑚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会认为新闻从业员有错？他是从那里知道的？

第三式：比。比什么？烂。以他人的错误，来合理化自己的错误。例如，“对巫统辖下另一集团控制媒体……有过什么表示？……”。事实是，我们一向来都有表示，我们一路来都有动作。承蒙四合一大媒体集团对此没有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是正常。我原谅吴海瑚对此事的无知。更何况，一个人没有对巫统表示过，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资格对张晓卿表示？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如果你答是，这个世界永远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人。烂，可以无限的比下去，没有尽头。

第四式：搞。搞什么？族群意识。扬起族群大旗，大搞民粹来掩烂。这是这一波反击攻势的主招式。主要动作有：（一）在族群内建构危机意识，树立一个面目模糊的狄夷假想敌，企图制造团结的氛围；（二）以大中华文化为饵，挑拨族群的大中华情结，试图把焦点转移。所以，当吴海瑚写下“他们只敢对同肤色的社群喊话，不敢向外人吭

声！”这种高族群意识，非理性，毫无营养，无关争议点，但却极煽惑人心的文字时，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显。

好了。看清楚了吧？贴、绑、比、搞，四招齐发、模糊焦点，转移主战场。不仅完全没有对反垄断者的论述有过任何的反驳，也完全没有提出一套为自方辩护的论述出来。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第二位：叶宁（右图）《谁在表达正义？》。《光明日报》总编辑写了这一篇文章，看完全文只有一个感觉：老样子，没有拼论述，没有比道理；还是跳脱不出贴、绑、比、搞，四招式的范围之内。

叶宁的第一招，先比烂。“懒散的前同事，金钱挂帅的前上司：……这些和反垄断的论述有什么关系？原谅我的不客气，从文章中，叶宁显露出一个可怕的认知——身份资格比道理论述更重要。再推深一层，我们可以得出她的潜台词——虽然我烂，但比我烂的人没有资格批评我；你烂，他比你烂，所以你的烂不算什么。

呜呼哀哉。我难过。当年畅饮黑狗啤，豪气干云，巾帼不让鬍髯的英雌，那里去了？我庆幸。幸好查卡利亚没搞媒体，不然报纸上的查卡利亚一定也会被描述成没犯什么错的好议员。

一招使完后，接下来第二招：绑。可怜的新闻工作者，再次被动的、不知情的被推上前线。事实是，反垄断运动的朋友们从来

没有怨怼你们，没有批评你们，没有置喙你们，没有针对你们。对于新闻工作者，我们从来只有谅解、只有体恤、只有呼唤、只有敬礼、只有尊重。真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在反垄断的课题上，我们有的只是期盼，没有任何的强求。

拉了群体到一个没有炮火的地方表演了反击之后，开始发出第三招：贴。原谅我，叶女侠，我不得不问。叫骂？在那里？抹黑？在那里？示威没人了解？从何得知？欺善是永恒的旋律？从何得知？全部没有过程，只有判词。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贴、绑、比、搞”，大卿帝国现在仅有的四式。这四式对普罗大众，没什么武功的朋友来说，或许还有点扰惑的作用。但是，招式用久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四下，终会有被大家看破的一天。从曾毓林、舒庆祥、吴海瑚、叶宁等等的文章看来，经过五年的长期论战，他们终究还是跳脱不出这个框架。这究竟是因为没有竞争和压力，所导致的论述大退步？还是大家慑于职权名利，经已失去自主提出另一种声音的权力？我不知道。

末了，吴海瑚说他听到狗吠，叶宁投诉有人在嚎叫。嚎叫？狗吠？或许有时间，我们要问问吴海瑚和叶宁，请他们说详细些，他们真的确定声音是从对方那里传出来，而不是自家的迴声？



系列七：星洲只靠一面之词

撰文／杨白杨 2006-11-12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会员、知名专栏作家

打从2005年528报变开始，罢写的评论人就认定张晓卿和马华的林良实和黄家定联手垄断中文报业。因此，他们不只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还停止供稿给张晓卿控制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不管星洲日报怎样否认他们的老板染指南洋商报，并对罢写者作出怎样的污蔑，张晓卿最终还是露出原形，闪身进入南洋商报。

刘鉴铨这些新闻界前辈如果真的以反垄断作为他们的信念，他们应该早在528发生时就和罢写的评论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五年来一直视罢写的评论人为敌人。当然也不是在五年后写出令人汗颜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并在文章登出登天，摆两辆拖格大罗里在星洲日报门口，阻挡前来静坐请愿的反垄断的大专生们。

星洲日报天天在其“沟通平台”刊登所谓读者来函和少数几个肯为张晓卿涂脂抹粉的员工的文章，然而这平台的每一篇文章，加上刘鉴铨那篇“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几乎都遭到反垄断的朋友们的驳斥。星洲日报打这笔战，仗的是星洲日报的读者多，反垄断的媒体的读者少。星洲在打笔战的过程中，要确保的是星洲的读者读不到对手的文章。

因此，星洲日报的文章从来不敢针对批评者的文章内容从作理性的辩证，谁都看得出星洲日报怕读者看到其对手的文章。反垄断的朋友们的作法就相反，每对星洲的文章有什么批评，都指名道姓指出我们批评的是星洲日报的那一篇文章。比方我们批评刘鉴铨的“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我们都确保我们的读者知道

刘鉴铨在这篇文章里写了些什么。但是刘鉴铨敢让星洲日报的读者看到我们如何批评他的文章吗？单就这一点，天下第一大报的朋友们就要感到脸红了。

星洲日报甚至不敢提到<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两个网站的名字。要和这两个网站的评论人打笔战，却连提这两个网站的名字的勇气都没有，怕的是星洲日报的读者们上这两个网站去，看到张晓卿和星洲日报的真面目。星洲日报应该鼓励其读者上网去看看其对手说了些什么话。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只能让星洲日报的读者听一面之词了。

星洲日报至少应该鼓励自己的员工上网看看<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说了些什么话，不要只是在沟通平台里说什么人家伤了全体星洲员工的心。反对媒体垄断的评论人只是伤了少数几位替张晓卿涂脂抹粉的新闻界前辈的心，我们完全没有意思要伤全体星洲员工的心。我们知道在四大报管辖下的新闻从业员，已经是失去了和同一老板议价的地位。他们是报业垄断的受害者，他们甚至打从内心反垄断，他们才是真正有资格写“反垄断是我们的信念”的人。他们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星洲日报应该作一个内部调查，看看整个报馆之内，有多少人愿意用真姓名站出来写一篇歌颂张晓卿的文章？不调查也不要紧，最重要不要让星洲日报的员工和读者只读一面之词。堂堂第一大报，和两个小小的网站打笔战，竟然怕自己的读者读到对手的文章，还大吹自己的“报人风骨”，太不新闻专业了罢？太伤了星洲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的自尊心了罢？

《黄丝带》网站开篇辞

—— 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

转引自《黄丝带》网站 (<http://www.wami528.com/>)，2005年8月1日

2001年，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成员党马华收购《南洋商报》、《中国报》，激起了广泛的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随即评论人成立了“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以下简称撰稿人联盟），誓言捍卫媒体独立，拒斥政党收购媒体，并反对媒体财团涉嫌与政党共谋，垄断媒体市场，因此推动罢写《南洋商报》、《中国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四大华文报章。5月28日为《南洋商报》、《中国报》沦陷马华虎口之日，是为“528报殇”之谓。

今年2005年正值528报殇四周年纪念日，撰稿人联盟架设了《黄丝带》网站，目的在于延续以往的媒体独立运动，并深化这股运动的理念与实践。黄丝带是新闻自由的象征，撰稿人联盟自愿充当马前卒，首先为这股批判实践扬起风帆。今后我们将秉持言论自由的精神，全面审思新闻自由、媒体监督与评议、媒体内部民主、媒体专业问题。

网站开张之际，我们首先开宗明义，重新厘清与诠释“528报殇”与“媒体独立”的关键，回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将要往何方而去”的问题，凸显我们对政治和媒体的思考，进而介绍我们要引介的议题，并提出我们经

营《黄丝带》网站的理念与原则。

议题一：政治制度批判

1997年金融风暴摧毁了亚洲经济奇迹的表象，为亚洲新兴国家带来两种巨大考验，它即是经济体制的考验，也是政治应变能力的测试，于是我们看到这股风暴在马来西亚打击了威权党国集团的脆弱经济体制，引发1998年党国集团内部权斗，进而使得公民社会苏醒。

政党是威权国家的代理人，其2001年收购华文媒体行动是威权国家压制公民社会独立言论的表现，目的是压制苏醒的社会自主力量，是党国集团面临政治危机而反扑的产物。我们不要忘记正是执政联盟在2000年吉打州鲁乃州议席补选失利，触动了党国集团收购华文媒体。

其实，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威权党国集团就一直打击媒体自主，建立国家霸权：1961年巫统收购马来文《马来前锋报》；1972年巫统收购英文《海峡时报》；1976年马华控制华文《新明日报》；1981年马华收购华文《通报》；1987年巫统党争、华小高职事件，国家关闭华文《星洲日报》、英文《星报》(The Star)、马来文《祖国日报》(Watan)；



1990年代马华控制《星报》。

2001年，政党收购华文媒体后，华文报业就进入了政治高压阶段。政党收购的媒体完全沦为党报，其新闻独立性殆尽；一般媒体为求生存日益仰赖党国集团势力，导致威权党国势力全面介入媒体，旧有华文报业相对独立的竞争机制于焉崩溃。至此，华文报业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尺度面临前所未有的紧缩，更甚的是，威权国家封杀了数位华文评论人，禁止报章刊登其言论，正可谓言论自由之寒冬期。其实，威权国家控制原有媒体后，也将权力的爪牙伸至新生独立媒体，例如：英文网路媒体《当今大马》(<http://malaysiakini.com>)就多次遭打压，被指为勾结外国势力，煽动种族情绪；黄泉安 (Jeff Ooi) 的时事评析部落格 Screenshots (<http://jeffooi.com>) 也同样遭官方打击。

反对政党收购媒体运动原初目的在于维持华文报业脆弱的相对自主性，意在迫使政党勿干涉媒体运作，然而如今形势使然，我们无意奢望短期有什么改变，但是如今我们更能看清媒体独立运动其实是自由民主运动的一环，我们应该把关怀的重点提升至制度批判的层次，阐释撰稿人联盟的核心关怀与运动方向。

所谓的制度批判主要指两个主题：一、关注言论自由为社会批判的前提。这导向我们关注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二、关注言论自由保障背后所牵涉的整套政治制度设

计。

马来西亚一直是种族威权体制，种族政党凭藉种族动员，挟持国家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形成朋党、恩庇政治。为了巩固其威权统治，威权国家扩张行政权，破坏自由宪政的三权分立原则，通过了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法令，拒斥新生媒体投入市场，控制少数的媒体机构，因而压制了自由民主批判言论。

我们以为印刷及出版法令的种种限制等于是变相的报禁，压制媒体自由设立及其生存。我们呼吁政府废除箝制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恶法，改报章出版准证制为登记制。我们也呼吁政府撤销官方机密法令，代之以资讯自由法令，规范国家资讯的流通与使用，以保障公民知的权利。

这一切理念都与自由民主的理想有关。换言之，我们必须引介关于制度批判的思维，深入反思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预设，进而为社会批判提供整体意义架构。

议题二：自由公平竞争

在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中，部分媒体财团态度暧昧，拒刊反政党收购媒体运动新闻在前，其高层人员漏夜辞职代表政党进驻被收购的对手在后，涉嫌与政党共谋。撰稿人联盟要求其澄清不果，因此发起罢写运动，并呼吁舆论关注单一媒体财团垄断华文报业的危机。2003年，新华文报章出现，华文报业兴起凶残恶斗，媒体财团以“市场竞争”之名围

堵对手，其实是封杀了公平条件的市场竞争机制。而该媒体财团当初涉嫌与政党共谋收购媒体，最后也不避嫌入主被收购的同行。这一切形势发展在在印证了我们当初的担忧。

我们严正反对媒体财团的垄断媒体策略及其围堵手法，因为我们相信市场竞争本有进步意义，但凭藉特权政治形成的市场垄断却使得市场竞争未得其利反得其害。

市场机制是资源分配的方式，也是自由民主的基础，健全的市场带来公开竞争与交流互动，是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机制，也是培养社会自主力量的场域。然而，我们应该要看到威权国家底下的朋党经济体制并非是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这种畸形市场压制竞争，却要以竞争之名，实际是凭藉特权之恩庇，打击新进入市场的竞争者。

就媒体业而言，威权国家的报禁制度形成入场障碍，堵住新媒体出现，使得部分媒体财团凭着特权关系形成实质垄断，再进一步控制传销管道，其所谓的“市场竞争”其实是特权集团消灭竞争的遮盖布和画皮。然而，压制竞争，并非是媒体业面临的独特危机，而是整体国家社会所面对的共同危机的一部分。

“伪市场竞争”下的“一报独大”，实何异于“伪议会民主”下的“一党独大”？又何异于许多公共事业在“私营化”、“市场化”口号下，沦为特定政商集团的禁脔？

威权党国集团造就了“朋党经济”与“伪市场竞争”经济活动，其所形构的畸形市

场其实是特权集团寻租夺利的工具，导致社会资源与政治影响力严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扼杀实质竞争与自由，进而破坏自由民主机制。

我们以为，这不仅是因为国家法令不健全和不公正，也是因为自由与公平竞争并未成为公众的核心价值与实践。许多人对市场竞争的看法趋于两极，或者因为对其充满强烈不信任而无意去建立规范，或者因为误解竞争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律而不相信规范有必要或可行。

因此，对治伪市场竞争衍生的实质垄断祸害，我们不但必须要求国家消除朋党经济，制定和修正法令保障自由与公正竞争，譬如媒体之解除报禁、政治之宪政改革、一般经济活动之公平交易法或反垄断法；更重要的是必须倡导公众辩论如何建立规范保障自由公平竞争，让自由公平竞争内化为社会共识。

议题三：媒体专业进步

我们关怀的乃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与新闻专业的普遍本质意义，而无意卷入报业特殊的党派利益争斗。媒体机构之间基于商业利益竞争乃是本然，并非是坏事，但是如果其竞争重点不在于新闻专业，公众或读者并不会受益。因而，华文报章尽管面临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压力，其首要任务仍然必须是凭着新闻专业精神和新闻品质赢得读者的信赖。



媒体机构必须体认到，彼此除了是商业利益对手，也有共同的利益与相互合作的底线。媒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竞争又合作：一方面就市场利益及媒体专业内容而竞争；另一方面为争取新闻自由及抗击威权国家而合作。

若媒体之间不能看清威权国家的宰制现实，双方采取公平的市场竞争，扩大彼此的生存空间，反而藉由仰赖党国势力，采取不公正的竞争手法，其结果只能导致双输，更强化了党国对媒体的支配，伤及媒体自由竞争的发展。

有两个群体，可以促进媒体业内正面竞争与合作关系。第一个群体是媒体工作者。从记者到编辑，从全职到特约，都必须建立跨机构的专业认同，不为资方利益所限制，视捍卫新闻专业为天职。媒体机构往往以国家机制、法律限制、政党压力，而掩盖自己专业能力的限制，甚至免除媒体工作者的内部民主质疑。因此，媒体行业要专业化，就必须深入检视媒体内部生态、媒体运作程序、媒体工作者专业能力、媒体工作者权益。

媒体工作者或因屈从于资方压力，乃至难挡外力诱迫，而未能坚守新闻专业，但我们不能单从道德伦理面去谴责，而是必须检视媒体业的经济结构因素。律师公会维护自由民主最能直言无畏，除了专业训练，岂与律师的经济独立无关？媒体一统对新闻专业的破坏，不只在于使媒体业主更容易为威权国家

所控制或利用，甚或成为其共犯；也在于使媒体工作者更容易为媒体业主所胁迫或压制。面对媒体资本日益垄断化趋势，劳方也必须集结成单一谈判集团，才不致为人鱼肉。就此而言，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以及其同业团体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与其它专业权益。为此，我们希望《黄丝带》网站能成为新闻同业沟通的有效平台。

第二个群体是读者与公众。读者与公众人数众多与利益分散，因此比媒体工作者更难组织起来。其结果有二：一、威权国家常常以公众利益代表自居，以国内外媒体个别的不专业行为污蔑新闻自由，以此合理化新闻管制。二、少数积极与媒体互动的个人或群体会取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无力承担维护自由与多元性之任务，而纵容个人或群体利用媒体只追求本身的利益与议程，普遍性的新闻与言论自由就可能沦为特殊利益之工具，并为其所害。

职是之故，社会需要广泛深入讨论，整理出新闻评议原则，并成立新闻评议会及媒体阅听人组织，鼓励公众发挥自主性，制约媒体市场竞争流弊，共同推动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同时防范少数特殊利益压迫社会的多元性。

自我期许：公民结社运动的理念与原则

《黄丝带》网站的成立是撰稿人联盟走

向更广大社会实践的标志，我们希望能藉此为公共讨论提供新的沟通平台，同时也为文化界注入理论反思与批判的新视野。

我们以为抵制威权党国集团高压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壮大公民社会的自主力量。公民在社会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中，才能获得更新力量，致力改造整体社会现实。换句话说，《黄丝带》网站就是公民结社自主运动，它是评论人、媒体工作者、媒体研究者与公民结社团体串联形成的自由民主同盟，它要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抗击威权国家，推动社会自由宽容多元言论；同时，也要监督媒体遵守媒体专业与公平竞争，并捍卫媒体工作者的权益与尊严。

昔日中国抗日结束、国共内战之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等人创设了《观察》周刊，服膺自由独立理性客观议政作风，大开风气之先，堪为日后自由独立言论杂志之典范。我们愿意跟随这个自由独立言论传统，并援引《观察》创刊号开篇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所揭橥的自由、民主、理性与进步精神，为我们的圭臬。我们的诠释与理解如下：

一、没有自由的社会是奴役的社会。国家权力要受适当的制约，使其不至于侵犯个人自由与尊严，必须保障人权与法制的秩序，才能抵制国家滥权与专断。免于高压政治，社会才能开放自由，累积文化果实。

二、民主原则指的是政治乃是众人之事，公共政策必须经由人民讨论，累积共识而决

定，不容少数集团垄断国家权力，置人民幸福而不顾。

三、理性是解决社会争议的准则，是客观就事论事的能力，需要优质教育而养成，唯有撇除种族、宗教情绪，乃至胁迫与暴力手段，凭心静气使用我们的理智思考，才能厘清事实的真相，进而安排公共事务。

四、进步指的是向前迈进，争取更好的生活前景。为实现这个理想，国家社会制度必须能够表现与容纳进步，进步的制度能够自我修正失误，在动态中保持稳定，而不失去生命力。若国家腐败专制，执行开倒车政策，就无异于自杀，使得人民陷入黑暗，社会停滞不前，置外于世界现代文明潮流。

另外，《黄丝带》网站标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在于纪念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巨擘陈寅恪，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尤能坚持自己提出的这个原则。这是思想殉道者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遗产，激励我们在这困顿的时代与氛围中追求高尚的精神品质，倡议独立之媒体，自由之议政。

我们将秉持以上陈义建设《黄丝带》网站。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积极与独立的，不服务于特定的派系利益，我们将建设多元与宽容的公共言论平台，让公共事务论辩有着床之处。最后，我们热切盼望社会人士给予我们批评与建议，共同催生自由民主理念，壮大独立媒体，并改造我们的历史现实！